

浅析义律违背训令占领香港的原因

李向锋¹, 李向红²

(1.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632; 2.西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香港问题的研究高潮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 割占香港的原因作为香港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多从经济、商人的角度考虑, 鲜有学者通过具体实例加以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对巴麦尊训令的目标、义律对于训令执行情况的考察, 揭示义律在香港占领、割让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并从义律违背训令这个案对于香港问题的成因加以探讨。

【关键词】义律; 训令; 香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1-0116-04

众所周知, 香港岛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 但是对于义律违背训令占领香港的原因却不甚了解。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从香港(香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指岛上的一个村, 战后才泛指全岛, 本文采用后一种说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英人对于香港觊觎已久、义律软硬兼施强迫中国割让香港岛的三个过程来探讨香港问题的成因, 很少有人从具体的事例对香港问题加以论述。因此本文通过对义律违反训令这一事件的考察, 指出义律在香港占领和割让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个案的角度揭示香港问题的成因。

一 研究概况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19世纪的香港》一书中, 作者主要从英国图谋中国海岛由来已久,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于香港的入侵, 鸦片战争前中英的交涉和香港的强占, 鸦片战争后期英国侵华政策的演变与香港割让四个方面论述割占香港的过程, 对于割让香港的原因主要从兵力、英军不适应中国的气候、印度总督奥克兰出于对殖民地鸦片、棉花的市场等因素对义律施加影响两个方面来阐释, 书中看到仅仅从经济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支持选择香港, 却忽视了从义律方面来看选择香港, 更有利于印度殖民地对于香港的军事支援作用。刘蜀永的《香港历史》关于割让香港问题的成因与《19世纪的香港》基本观点相同。王庚武著作《香港史》第三章殖民体系的建立与演进, 第一节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 从罗便臣、渣甸等在华英商, 伦敦东印度协会对义律造成的影响加以阐述, 同时注意到了义律在华多年, 积累丰富的经验, 作为一线的负责人与远隔万里的巴麦尊取舍自然不同。但是他忽略了鸦片战争前, 义律与巴麦尊持同样的观点——选择舟山, 在分析舟山的实际情况后, 他不得已转而坚持割占香港。萧致治的《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刘

存宽《英国夺取香港的第一步——割占香港岛》等论文对于割让香港的原因局限于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英人对于香港觊觎已久、义律软硬兼施强迫中国割让香港岛的三个过程来论述, 其观察问题的角度总是站在受害者的一面, 却没有转换一个角度分析香港问题。如, 义律为什么没有遵照训令选择舟山? 义律为什么选中的是香港而不是其他地方? 一些有关香港问题的专著虽然从经济、商业等因素考虑义律选择香港的原因, 但仅仅是从宏观方面一笔带过, 没有就此问题细化到义律个人方面深入展开。因此本文在前人注意到经济、地理重要性的基础上, 从义律违背训令这一事件对于割占香港问题的成因进行进一步探讨。

二 巴麦尊训令的主要目标

1839年9月, 林则徐虎门销烟使罪恶的鸦片贸易受到空前沉重的打击, 引起英国资产阶级舆论大哗。伦敦、利物浦等地工商界人士、英国鸦片贩子纷纷上书外交大臣巴麦尊, 发布请愿书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鼓吹对华进行战争, 英国国会以微弱的优势通过对华战争的议案。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发出《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总体对华目标: 首先要英国政府君主遭受侮辱、商人所受损失、军费等方面进行赔偿; 其次, 允许英国臣民不分男女在中国一些主要港口自由居住、自由贸易; 第三, 英国政府有权任命商务监督, 并同中国政府及各地方当局保持联系; 第四, 商务监督具有领事裁判权; 第五, 开放通商口岸, 关税、利益均沾等方面。最后, 割让岛屿, 但是训令中还明确的提出“二者择一”的方针, 要么给英国五口商通, 要么割让一岛或数岛。

同时还提出具体的阶段目标: 1、封锁珠江口; 2、舰队北上截断厦门与台湾的联系; 封锁扬子江、黄河口; 占领舟山, 作为总指挥部所在地; 投递外交

文书;在此期间可以扣过往船只。3、上直隶湾。^[1]

三 违背训令占领香港

1840年8月11日英国侵略军到达天津白河口,8月30日投递《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书》提出割让土地的要求,后决定广州为谈判地点。1840年12月11日,琦善与义律在广州举行会谈,主动提出:“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断无偿价之理,”但中方拟设法筹酬银洋500万元,明确指出此项未得到皇帝允许,是琦善自己筹措,分10年给予,并坚决反对割让岛屿。第二天,义律回复琦善,要求赔偿烟价700万元,并开放广州、厦门、定海对英贸易,并首次提出占据香港的要求。若中方同意三口通商,则可以放弃割让土地的要求。3天后,中方再作让步,表示赔偿烟价可以增至600万元。英国交归定海后,通商口岸除广州外可另增一处。12月17日,义律复照同意鸦片赔偿为600万元,但通商口岸必须在浙、闽两省或闽、苏两省各增开一处,若中方接受上述条件,并订立条约,英国才允许于1个月后撤出舟山。^[2]后于1841年1月11日义律海军上校致琦善照会中明确表示:接受香港海岸、海港以代替穿鼻,愿意将定海立即交还给帝国政府的官员。1月19日,义律写信给琦善,他“现在将要求总司令官立即放弃沙角、大角的阵地,把军队撤回香港。”^[3]随后义律迫不及待发表申明:“1、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但应付给清政府所有捐税,与黄埔港一样。2、赔款600万元,立即支付100万元,余款每年支付,1846年付清。3、平等进行官方交往。4、中国春节后10天,开放广州贸易。各细节有待进一步谈判。”1841年1月26日,义律武力占领香港。

从训令的目标和谈判的内容而言,二者之间相距甚远。义律对于训令的违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撤出舟山,占领香港。训令要将舟山作为占领地或要挟清政府的筹码,而且巴麦尊认为英国毫不费力的占领舟山,已经实足安全的守住了它,不致受中国人的攻击,可以随便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4]但是义律却“莫明其妙”的将其放弃,撤回香港。2、赔款数额。按义律同意赔付颠地公司每箱鸦片500元计算,赔偿英商总计10141500元。^[5]但是义律争取到600万元,分5年还清,而且同意琦善不支付利息的做法。^[6]3、向北面开辟其它口岸、并派监督和领事,^[7]义律用割让香港代替增开口岸,而且要向清政府缴纳税收。4、英军费用问题、行商问题均未涉及。巴麦尊认为义律没有有效运用所掌握的兵力,违背训令降低要求,因此以殖民老手璞鼎查取代义律。

四 巴麦尊与义律对于占领香港的分歧

义律占领香港并对其实施统治。巴麦尊认为香港是“连一所房子都难找到的荒岛”,并且“不会成为贸易市场,正同澳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以前往香港荒岛,……代替去澳门消磨非贸易月份罢了”^[8]。需要指出的是,最初义律和巴麦尊同样看好舟山,断言不久可以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场所。但在随后的实际战争中,他改变观念违背训令,选择占领香港,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香港地处要冲,深水、避风两大优点不仅吸引前人的注意力,同样也为义律所看重

1、重要的地理位置。18世纪以来,香港已成为来华船只停泊、取水所在地。义律的老上司罗便臣早在1835年4月就建议把在华英商全部转移到“大屿山与香港附近美丽的海港去。”^[9]香港位于珠江入海口的东部,是北上闽浙,东赴惠潮的必经之地,林则徐在上《筹议添建炮台折》中就明确指出香港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查广东水师大鹏营所辖海面,延袤四百余里,为夷船经由寄泊区,……而就粤省通道而论,则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必扼设防,方足以资控制……”^[10]。由此可知,香港为“粤海适中之地,……若令夷人筑台设炮,久必窥伺广东。”^[11]拥有了香港不仅可以辐射广东全省,同时也控住了北上的要道。

2、深水良港。港埠所在地,地狭不足半公里,而水深达七至二十一公尺,港阔水深,实为我国东南岸的天然良港。香港岛与南丫岛之间的东博寮海峡与港岛南部的大潭湾,是良好的避风港。1821年,道光帝下令驱逐鸦片船后,英国商人就把鸦片走私转移到伶仃洋一带,冬季在伶仃岛附近。遇台风季节,鸦片贩子就把船移泊到金星门和香港水域避风。但是舟山根据义律的亲自了解,“与我们以往的偏爱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适合我们的目标。航行充满危险,除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基本无法通过。”^[12]

(二) 义律作为职业军人,其思考方式自然有别于作为政治家的外交大臣巴麦尊。英人对于中国沿海气候的不适应,英属印度殖民地便于为香港提供军事支援和食物补给的优势,是义律选择香港的决定性因素

1、英军面临困境,兵力不足。一方面侵略者在城乡各处抢掠破坏,浙江沿海的镇海、慈溪、余姚等地人民激烈反抗。人民自发组织抗英团体,以游击方式打击英人,使其龟缩于岛上很小的区域。留岛居民与渔民,同仇敌忾,一律拒绝向占领军出售食

物。但是印度的食物由于路途遥远、天气炎热,运到舟山已经腐烂变质。另一方面,英人不仅要面对死亡、饥饿,还要忍受舟山的气候。英军皇家第26团在占领初期,有军官28名,士兵902人,到1840年末,病死240名,死亡率超过1/4,病员多达数百名,可以执勤士兵仅110名。舟山有驻军3000人,到1840年末死亡450人,其中多数死于热病和疟疾。但是军官当中没有几人遭受这种打击,只有一两例死于气候原因。^[13]1840年9月29日,义律从直隶返回舟山,发现事态严重。^[14]因此认为,占领香港没有遭到当地中国人的反抗,原因在于岛上人口稀少和人口分布情况。如果香港和舟山一样繁荣富庶,人口众多,广为人知,肯定会是另外一种结局。1000名枪手是在一个充分广阔和安全基础上占领这个岛屿所需要的最少数目。^[15]显然,义律选择香港在于运用有限的兵力进行有效、有限的侵略占领,港岛无论从大小和人口数量都是最合适的。

2、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坚强后盾作用。侵略中国的英军主要由英属印度殖民地(孟加拉、马德拉斯等地)派出,军费亦由其筹措。^[16]首批侵华英军即有孟加拉第49志愿团,孟加拉工兵队等。由于在舟山的损失,英属印度殖民地马上派出马得拉斯土著步兵团600人和“复仇神”号汽船给以增援。1842年5月14日至6月22日,从英属印度殖民地运来马德拉斯土著第二、六、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团,此外孟加拉志愿兵团、工兵、印度炮兵共计6749名。^[17]显然英属印度殖民地作为香港有力的支援者,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与补给。如果选择舟山,作为大后方的英属印度殖民地要想对舟山救援(如前文的食物、军事等),就必须通过香港岛、台湾海峡,不仅时间长,而且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 巨大的贸易,在华英商的唯利是图,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义律选择香港的主要动因

1、保护英国在粤的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当时,英国在中国走私鸦片贸易的数量、利益已经相当可观。十九世纪初期,平均每年走私鸦片4000多箱(不同公司每箱的重量从120~150斤不等),1828年每年超过10000箱,1839年竟达到39000箱。^[18]整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160万英镑的收入,相当于其财政收入的7%。^[19]据最低估计,鸦片战争前20年内,外流白银接近一亿两,平均每年外流4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10%的财政收入。^[20]这些利益除大部分为东印度公司所得外,英国商人也有每箱走私鸦片获利甚巨。大鸦片商渣甸(William Jardine)就曾表

示在销售旺季,每箱纯利润高达1000元。^[21]且广东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对外贸易,比北方人熟悉英人的性格和动机,显然要保护的是广州的贸易。虽然北方的贸易有远大前途,但不局限于对未知事情怎么样安排,对于这个眼前利益最好的安排是占据香港。

2、把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货栈。长期以来,英国商人就想寻求一个脱离中国政府监管的贸易中心,即为英人所期盼,亦可“效华商坐庄买卖之计也”。^[22]义律在1841年6月21日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函中表示,“我们在中国行动方面的特殊和不可思议的困难,就是因为在我们手上有大量财产不断涌入,……在本函寄发的当天,正有着大量吨数的货物在聚集之中,……在香港建筑堆栈,……以省去一只装满货物的大船队,因耽搁而产生的任何大量过期费用和开支。”^[23]随着贸易的增长,贸易量的加大,英人货物堆积如山。特别是林则徐严禁广州贸易后,1839年10月27日,义律被迫致书澳门葡总督宾多,请允英人货物运至澳门囤贮,被拒。^[24]英商势必要寻求一处货栈寄存货物,香港的割占,既可以打探广州货物价格情况,以随行就市,又可以作为货物贮存地点,以满足贸易利润增长和在华英商的需要。

(四) 义律的屈辱性经历,坚定他选择香港的决心

义律的亲身经历,促使其选择香港。义律在林则徐下令封锁贸易后,被迫于1839年5月24日,随同尚未离开广州的所有英国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后澳门葡总督在清政府的压力下,令英人离澳。澳门最有影响的葡萄牙居民对英国在这个地区利益是敌视的,而他们确实做了积极的努力增加我们的困难。^[25]后因林维喜事件,林则徐为逼迫义律交出凶手,实行断绝新鲜食物和淡水的措施,布告沿海居民,“防止英人近岸采办食物”,^[26]义律不得已又致书澳门葡总督,请允“女王陛下的臣民返回澳门,并尽力提供帮助”,^[27]但又委婉地拒绝。^[28]只好布告香港居民不得“于井内投毒”。这种惶惶如丧家犬的经历,使得义律一方面反对开放更多的口岸,他认为“开放更多的口岸,不啻于将更多的人质,在更多的地方落在一个被激怒的政府手中”,最好的方法是“保住香港,并在那里集中英国人的力量”。因为,即使中国君主在“武力胁迫下答允开放港口,那玉玺并不能保证英人的性命和财产……香港在我们的掌握中,驻有足够海军,我认为实在毋需在东海岸建立永久根据地”。^[29]而这一切都是远隔万里、高高在上的巴麦尊所无法想象,没有经历

的事情。因此,义律不顾巴麦尊的训令,选择香港,撤出了舟山。

五 总结

从以上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义律不仅在发动鸦片战争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他也是占领香港的

建议者、实践者。传统认为香港的割让是鸦片战争失败的恶果,本文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是割让香港的一个前提,义律违背训令在香港的占领以及其继任者坚持义律的主张才是最终构成香港问题的主要成因。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2][3][6][27][28]胡宾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Z].北京:中华书局,1993:537,800,802-803,895-897,816.
- [4][5][7][8][15][23][29][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700,707,708,709,710.
- [9]外交部档案.1835年4月13日,F. O. 17\9.
- [10][清]文庆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M].北京: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31-32.
- [11][清]魏源著.魏源集(卷二)[M].道光洋艘征抚记(上):178.
- [12][英]弗兰克·韦尔什著.香港史[M].王皖强,黄亚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33.
- [13][英]霍尔特.两次鸦片战争[M].1964:110-112.见,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M].北京:中华书局,1994:54.
- [14]Captain Elliot to the Earl of Aberdeen Cadogan place ,F.O.17 / 61,1842年1月25日.
- [16]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M].北京:中华书局,1994:64.
- [17]英国议会文件汇编中国[Z],第27卷第65页.见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J],历史研究,1983,5.
- [18]G.B.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M],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4:11.
- [19]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Z].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26.
- [20]凌耀伦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68.
- [21]M.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 [M].Cambridge press1951,p105, Footprint 2.
- [22]筹办夷务始末[M].道光朝,一册,卷七十,耆英通商善后案内实在情形折:2778.
- [26]澳门军民关于禁止供应英人粮食和下令所有被英国人雇佣者离开的两个告示[N].鸦片战争与林则徐资料选译[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04.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Reason of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

LI Xiang-feng¹, LI Xiang-hong²

(1.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2.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first high tide of research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appeared in 1997 when Hong Kong returned. A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there had been few scholars who paid attention to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 from the concrete example. This article inspect the mandate purpose of the Palestinian and the Elliot who take the mandate into action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Elliot in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 This thesis will further analyze the internal reasons of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 from the aspect of Elliot breached diplomatic Mandate.

Key words: Elliot; Mandate; Hong Kong